

林辉：戈尔巴乔夫断言中国变革绝对不可避免



图为2022年9月3日，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在莫斯科出席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追悼会。(ALEXANDER NEMENOV/AFP via Getty Images)

更新 2025-04-30 1:51 AM 人气 54

标签：戈尔巴乔夫，集体农庄，大跃进，解体中共，中国变革

【大纪元2025年04月30日讯】在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名人榜上，曾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必定占据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正是他推动的“新思维”改革，在苏联第一次实行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部分差额直接选举。通过民主选举，20%的非党人士获得了胜利，在党内受排挤的叶利钦和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都成功当选。

与此同时，他对华约成员国政策的改变，则引发了东欧剧变，东欧绝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高层顺应了历史潮流，放弃了共产党一党专政，以和平的方式走向转型。而苏联也在1991年分崩离析，改变了世界格局。虽然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如今再度出现高度集权，甚至发动了侵略战争，但相较于当下的中共治下的中国而言，俄罗斯人多少还是享有中国人无法拥有的自由。当下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回到苏联时期了。

那么，是什么推动戈尔巴乔夫走上了变革之路？《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给出了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祖父辈曾受到迫害，这给幼年时的戈尔巴乔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戈尔巴乔夫的外祖父一战后，从土耳其前线返回，祖父则从奥地利前线返回。他们都是贫穷农民家庭，最初，外祖父非常感谢苏维埃，因为给了他们土地，在苏共在农村推行合作化后，他组建了一个集体农庄，担任主任。

1938年，外祖父被指控为托派分子，遭到逮捕。折磨调查了十四个月，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之后，案子被提交给地区检察长，因没有发现犯罪证据，将其释放。然而，此后，邻居们不再敢来串门，家里的房屋也被打上“人民之敌房屋”的标签而置于监控之下。

而戈尔巴乔夫的祖父则拒绝加入农庄，选择单干。1933年当地发生了大饥荒，普利沃诺柳村多达40%的村民死亡。祖父一家也受到沉重打击，孩子因为没有饭吃，三个孩子在冬天饿死了。在春天到来时，因为没有种子播种，祖父未经同意动用家里贮藏的玉米播种，被苏联当局认定破坏农业生产，将他流放到西伯利亚。由于表现好，1935年提前回家。此后不得不加入农庄，直到去世。

第二个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在上大学后，开始质疑某些说法。

经历过农村苦难的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上大学时，发现书本上很多关于农民政策的叙述让人感到难以理解，或者说是错的。

按照戈尔巴乔夫所言，在当时的苏联，农民的地位等同于沙皇时期农奴的地位，他们甚至不能持有国内护照，不能在自己国家里旅行。

此外，那个时候的税收政策更是十分严苛。每个农民家庭，不论是否饲养家禽，都必须向政府交纳20公斤肉和120升奶。财政部长还通过法律，对果树征税，不管每年是不是结果。结果导致农民开始砍伐自己的果树。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农村人比城里人更加怀疑现存秩序的公正性。这也导致他对课本上所写的“最公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各族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敬爱的共产党”等，内心是怀疑的。他甚至成为了大学里的“异见分子”。

1952年斯大林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老师认为在课上朗读全文是最好的教学举措。戈尔巴乔夫认为这太过分，就给老师写了张纸条，说在课堂上机械读是对学生的侮辱。老师勃然大怒，在课堂上公开说某个狂妄自大的人甚至不敢在纸条上留下名字，自以为已经掌握了“斯大林同志著作中的所有内容和结论”。

血气方刚的戈尔巴乔夫马上站起来说是自己写的，老师于是上报给学校的团和党组织，因为他良好的出身，所以被软处理，得以继续在大学读书。

第三个原因是在苏共从下至上官场的任职经历，以及出访经历，让他看到了苏共存在的问题。

大学毕业后，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党内一路升迁。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关于个人崇拜的讲话，抨击斯大林，人们反应不同。彼时戈尔巴乔夫被派到基层去宣讲二十大成果，但对此，人们并不相信，一些人为斯大林的大清洗辩护，说“他们是咎由自取。他们这些人把我们赶入集体农庄……欺压人民”，“斯大林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此后，各省向中央提交的报告使得苏共最高层对斯大林的评价做了一些调整。最高层认识到对斯大林的批评就是对制度的批评，这威胁到了制度的本身。更重要的是，人们开始问现任领导人：“当时你们都在哪里？”

不仅苏联国内有不同的反应，就连其他共产国家也不认同。后来任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安德罗波夫曾告诉戈尔巴乔夫，二十大不久，他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匈牙利领导人马加什私下就对他：“这不是做事的方式。他不应当这么匆忙。你们在你们大会上制造的混乱是一场灾难。贵国和这里要发生什么，目前尚不够明了。”

国内外的反应使苏共开始开倒车，开始重新指出“斯大林是坚定的马列主义在”，声称没有任何“个人崇拜”能够改变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到了勃烈日涅夫时期个人崇拜复活，斯大林再次受到赞扬。重建、民主化和新政的实施过程放慢，70年代陷入停顿。而亲历这些的戈尔巴乔夫不能不受到影响。

戈尔巴乔夫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对斯大林的批评从道德上破坏了苏联制度的声誉，但产生了变革的希望，推动了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发展。

在他看来，对斯大林的揭露表明了赫鲁晓夫在历史上扮演的矛盾角色。一方面，他表现出胆略、勇气和决心以及逆流而上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他的政治思想受制于旧的束缚，不能或不愿揭示这个他与之斗争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他无意分析极权主义的原因，也许他永远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摒弃他所信奉的信条。但他遇到强大的抵抗，最终失败。而这正是掌权后的戈尔巴乔夫想做的。

在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后，苏共也发起了“大跃进”。1958年末，赫鲁晓夫为当年的农业大丰收所陶醉，公开宣布要在人均牲畜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他向干部们明确表示，他要看到迅即和壮观的成果，通过设定一个完全不现实的任务指标，鼓励人们以不顾廉耻的方式来造假。

这样的结果就是随着政府收购量的增加，农民们被迫出售他们的牛，政府还要到邻近地区去采购牛。其中梁赞地区书记拉里奥诺夫特别狂热。

1959年，梁赞地区超过年度肉类收购目标的三倍，斯塔罗波尔边疆区超过两倍半。这样的代价是绵羊、马和野生动物都被杀掉了，农民自留地都荒废了。就像同一时期发动“大跃进”的中共官媒一样，苏联的媒体也为“第一批成就”而欢呼，要求其他地区学习。

身为基层官员的戈尔巴乔夫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不过，这样的做法很快就真相大白了，拉里奥诺夫开枪自杀，而肉类生产运动对苏联的打击非常大，其后果延续很多年。

1964年10月，曾经持赫鲁晓夫挑战“反党集团”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同样将他打倒，因为他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为了保住官位，他们选择让他下台。

1979年戈尔巴乔夫成为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年后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随着戈尔巴乔夫进入苏共中央，认识了更多的苏共高官，他发现在高层生活里，留给单纯的人类情感的空间极少。在他眼中，安德罗波夫是一个沉默含蓄的人，对意识形态的问题十分敏感，对经济问题不感兴趣，对改革逐渐失去作用的原因也不去理会，但对戈尔巴乔夫十分友善和器重。

另一个政治局常委柯西金，在戈尔巴乔夫的眼中，是一个记忆力超强，能轻松脱口说出国内外的人物和局势。他十分讨厌地方官员的阿谀奉承，不喜欢“礼节性”的官方活动，也不喜欢参加社交聚会和空谈。他感兴趣的是与人见面，处理文件，读书和散步……。他不愿意谈论斯大林时代，但有一次话题突然落在这个问题上，他告诉戈尔巴乔夫，“我们处于完全的监视之下，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你永远也不会落到视线之外”。

此外，在戈尔巴乔夫眼中，指令经济和中央官僚化国家的决策体系实在是糟糕。无论什么问题，均需呈报国家计划委员会，均需得到数十个部委和数百名官员的批准。这需要地方官员无数次进京、开会、和申辩，而那些不同部门的官僚则处处阻挠……。

当情况确实出现恶化时，精英及其宣传机器却在吹嘘成就。中央政府期望地方官员能够上报迅即和显眼的成果。当然，“只有有需求就会肯定有供给。那些说大话的人被当作英雄来对待，那些埋头苦干俄人让人觉得可怜。”

还有，如果“想法”是从上面传下来的话，执行者就不会受到惩罚。如果有人提出什么创意，那么这个人的前程就会被打上问号。要是严格遵照上面传达下来的决议和指示办事，就无法完成任何有用的事。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创意是要受罚的”。

无疑，戈尔巴乔夫描述的苏联体制种种弊端，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同样存在，其所描述的各类苏共高层，在中共内部同样存在。

而作为苏共要员，他还有许多出国访问旅行的机会，曾去过比利时、西德、加拿大、英国等西方国家，而他所看、所听到的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的政治观点和对社会的看法。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苏联因为与美国的军备竞赛，经济发展缓慢，腐败也十分严重，越来越多的苏联人也不再相信共产主义和苏共，苏共业已失去了民心。对苏共体制有着切身体验和善于思考的戈尔巴乔夫最终在掌握苏共最高权力后，选择了推动变革，并最终让东欧共产国家摆脱了共产党的控制。戈尔巴乔夫在历史上为自己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结语

2011年8月，英国《卫报》在苏联解体20周年之际，独家专访了戈尔巴乔夫。当记者问到他最遗憾的事情时，他毫不犹豫的说：“应该早点离开共产党。”

《卫报》报导称，在1个小时的访谈中，戈尔巴乔夫至少说了5件担任共党总书记时觉得遗憾的事。头一件他说道：“事实上，在尝试改革共产党的路上，我走过头了。”他表示应该早几个月，在1991年4月辞去总书记职务时成立民主政党，因为“共产党对所有必要的改变都踩刹车”，“它（共产党）使改革停滞，尽管它启动了改革。他们都认为改革只是化妆的需要而已。他们觉得表面粉刷一下就够了，事实上里头仍是同样的陈腐秽物。”

在接受《卫报》采访时，戈尔巴乔夫对于是否如中共那样首先实施经济改革而非政治改革的说法的回应是：“如果我那么做，苏联不会有任何改变。人民完全被隔绝于决策之外。我们的国家与中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我们来说，解决问题必需有民众参与。”

而对于中国的看法，戈尔巴乔夫表示，就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的变革绝对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的中国业已走入了历史的关键时刻，不管现在掌握最高权力的是何人，如果继续选择保党保权力，而不是解体中共，那下场注定是可悲的。

责任编辑：莆山

相关专题：[林辉](#)